

我国参与跨境贸易结算国际合作方式探析

◎孙晓涛

摘要:当前,发展中国家摆脱美元结算依赖意愿很强,多国表现出与我国合作的愿望,加强跨境贸易结算国际合作也符合我国利益。中央银行是结算体系的核心,多样化的中央银行间结算合作模式可以为我国提供借鉴。综合考虑当今形势、我国现实和国际经验,本文对我国参与跨境贸易结算国际合作的可行方式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一种介入程度较低的方案是对我国双边本币互换的功能进行扩展,使其具备人民币多边净额清算能力。另一种介入程度较深的方案是参与创建中央银行间多边净额结算新机制,该方案的复杂性和敏感性都较高。

关键词:中央银行国际合作;双边本币结算;多边净额清算;欧洲支付联盟;亚洲清算联盟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近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美元的不信任感增强,越来越多国家表露出摆脱美元结算依赖的愿望,提出很多美元结算替代方案。目前来看,现有替代方案各具优势,但也都存在局限性,国际社会尚未达成共识。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各国在摆脱美元结算依赖问题上对我国期望很高,从自身利益出发,我国也需要加强跨境贸易结算领域的国际合作。

一、现有美元结算替代方案及其局限

国际货币体系虽然纷繁复杂,但纵观历史,能够充当国际货币的无外乎主权货币、超主权货币、实物货币三种,现有美元替代方案也都基于此。

(一) 新兴主权货币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货币国际化持续推进,影响力不断提升,但与美元、欧元、日元等相比差距仍非常大。以人民币为例,Swift数据显示,2023年12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为4.14%,排名第4位。虽然人民币的排名已经很靠前,但占比却非常低,美元等货币表现出强者恒强的态势,因此,新兴主权货币在短期内与传统通用货币分庭抗礼的难度很大。更进一步,目前美元面临的问题是以主权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问题,其他主权货币置于美元位置后同样无法避免,包括特里芬难题、第N种货币问题等。过去80年的现实经验证明,虽然美国尽力解决各类问题,其他国家也尽力忍耐美元霸权,但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失去耐心。

(二) 本币结算

如果把以主权货币为中心的结算模式比作集中

作者简介:孙晓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综合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式系统，那么本币结算模式就是分布式系统，虽然后者在效率和成本方面竞争力不足，但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本币结算模式关注度明显上升。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之间达成双边本币结算协议，减少对美元结算的依赖。但双边本币结算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从量的方面看，任何两个国家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国际收支失衡，随着一方不断增持另一方货币，如果债务方存在较多汇兑限制，债权方累积的债务方货币资产很可能将面临使用困难。从价的方面看，两国货币经过另一种货币计算出的交叉汇率很可能与两国货币直接交易形成的直接汇率存在偏离，而消除或者管控这种偏离从而避免套利资金冲击，需要付出一定成本。

（三）超主权货币

20世纪60年代，美元危机持续不断，国际社会急需新的储备资产，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SDR），但此后50多年里SDR始终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此外，还出现一些区域性共同货币，最成功的是欧元，其已经对欧元区20个成员国的主权货币进行了彻底替代。超主权货币最大的局限是协调成本太高，大型经济体担心小型经济体成为自己的负担，小型经济体担心话语权不足失去经济金融独立性。同时，超主权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面临考验。以欧元为例，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欧元区应对风险时的协调能力明显不足，创设仅十余年的欧元区险些解体。

（四）实物货币

实物货币不受任何国家控制，可以完全摆脱主权货币依赖，也不存在创建超主权货币的高额协调成本。黄金曾经长期在全球范围内行使货币职能，在所有实物货币备选者中潜力最大。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可以通过深入的国际合作、恰当的机制设计以及与其他类型货币的配合加以解决。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耗尽了国际社会耐心，最终，体系解体，黄金与美元脱钩，各国汇率自由浮动，黄金货币职能逐渐弱化，

被抛入大宗商品范畴，商品属性越来越突出。在50年后的今天，黄金重新融入现代国际结算体系、获得足够的货币属性难度很大。

（五）小结

从上述关于替代方案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本币结算模式可以看作双边全额清算系统，流动性占用多，各方头寸轧差困难。超主权货币模式可以看作多边净额清算系统，流动性占用少，但只能采用单一币种清算，多方共识很难达成，系统稳健性和抗干扰性也不足。一种可行方式是融合上述两种模式。从历史上看，每当国际硬通货可得性出现问题时，都会出现大量双边本币结算协议，如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由于双边本币结算的流动性利用率低，对国际贸易存在抑制作用，各国又有动力推动双边结算协议的多边化，例如，1950年成立的欧洲支付联盟（European Payments Union）。当前，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和滥用对外金融制裁，间接导致了作为国际硬通货的美元可得性下降，本币结算的异军突起是各国应对美元可得性危机的自然选择，而能否推动双边结算协议多边化则需要国际合作。中央银行是各国银行业的核心，担负着搭建各国银行清算系统框架的职责，双边结算协议多边化需要各国中央银行的深度参与和紧密合作。

二、中央银行间结算合作模式的比较分析

国家之间以及一国内部普遍存在收支不平衡，这是结算的一大难题。结算主体之间利益一致性越高，结算时收支不平衡问题越容易处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国采取中心化结构的中央银行，该国内部各种形式的收支不平衡问题都不需要解决，甚至不会被统计。本文按照结算主体之间利益一致性由高到低列出历史和现今的一些中央银行间结算案例，以求为探索新模式提供参考。

（一）美联储各联储银行间的结算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采取去中心化结构，包括12个联邦储备区和为该

区单独成立的联储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各联储储备区内机构跨区收支都要通过该区的联储银行进行，各联储银行资产负债表资产方下都有科目“区际结算账户”（Interdistrict Settlement Account），记录清算时累计的净头寸，12家联储银行该科目正负不一，合计为零。区际结算账户反映了美国区域收支不平衡状况，12个联储储备区同属一个国家，彼此利益一致性很高，可以对该账户进行调整。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黄金证书、发行的货币、公开市场账户（System Open Market Account, SOMA）等科目每年都需要在各联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重新分配，区际结算账户调整就结合到上述科目重分配过程中。每年4月计算各联储银行过去1年区际结算账户余额日均值，将其贷记区际结算账户科目并借记黄金证书科目。之后，各联储银行调整黄金证书科目余额，使其在美联储黄金证书总额中的占比与该联储银行发行货币在美联储发行货币总额中的占比相等，并将调整后余额与调整前余额之差借记黄金证书科目并贷记公开市场账户科目。

通过以上过程可以看到，每年都采用区际结算账户结算日余额减去过去1年余额日均值的操作，避免了区际结算账户余额的累积。黄金证书是由美国财政部用黄金储备作抵押发行的，是各联储银行最核心资产，适合充当结算货币。货币发行是各联储银行的重要责任，以承担该责任的多少来重新分配黄金证书是合理的。各联储银行黄金证书科目的调整用公开市场账户科目来平衡，是一个合理的安排。公开市场账户是美联储重要资产，该账户持有证券的利息收入是美联储的主要收入来源，虽然该账户由纽约联储银行持有和操作，但需要分配给各联储银行。公开市场账户规模很大，2022年年末为8.14万亿美元，不至于出现某家联储银行结算时头寸不足的情况。同时，公开市场账户收益按每家联储银行开业时的股份进行分配，避免了公开市场账户份额调整对各联储银行收入的影响。

（二）欧元区中央银行体系清算系统

欧元区中央银行体系（Eurosystem）也采取了去中心化结构，由欧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和20个成员国中央银行共同组成。1999年欧元诞

生时欧元区各成员国原有实时全额清算系统连接组成了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TARGET），2007年第二代系统TARGET2实现了对各成员国自身实时全额清算系统的替代，目前正在向2023年上线的新一代实时全额清算系统（T2）过渡。与美联储清算系统类似，各成员国内机构跨境收支也要通过该成员国中央银行进行；与美联储不同的是，各成员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头寸会转化为两者各自对欧央行的头寸，采取中央对手方结算方式。欧央行和各成员国清算时累计的净头寸计入资产负债表科目“欧元区中央银行体系内债权”（Inter-Eurosystem Claims）或“欧元区中央银行体系内债务”（Inter-Eurosystem Liabilities），考虑欧元区外国家持有的少量头寸后合计为零。

虽然欧元区以经济一体化为目标，但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毕竟属于不同国家，利益一致性明显低于美联储的各联储银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除部分交给欧央行外绝大部分仍为私有，执行货币政策获得的资产也很难公有，收支不平衡问题的解决难度明显增加。目前被采用的方式是，将未结算余额保留在各成员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持续累积，按主要再融资利率（Main Refinancing Rate）支付或收取利息。这是一个折中方案，各成员国中央银行之间没能通过利益重新分配来消除未结算余额，同时，各成员国之间又想保持利益交融，并不想强迫债务方通过自有黄金储备等资产来结算。

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资本跨境流动非常便捷，正常情况下各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可以通过私人部门的跨境融资弥补，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未清算余额整体规模并不大。但是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金融脆弱成员国信用严重下滑，弥补国际收支失衡的私人部门跨境融资中断，不得不求助于本国中央银行弥补跨境资金清算缺口，欧元区中央银行体系清算系统不平衡迅速扩大。2014年10月和2015年3月，欧央行分别实施了资产购买计划（APP）和公共部门购买计划（PSPP），再次引发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清算系统不平衡再次扩大。此后，清算系统不平衡扩大势头一直延续至今，2023年年末达到1.62万亿欧元，是2008年5月末国际金融危

机前的 8.7 倍。

(三) 欧洲支付联盟

欧洲支付联盟由 1950 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 是 OECD 前身) 的 18 个成员国创立, 于 1958 年解体, 共运行了 8 年。当时, 各成员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 保障本币结算不会造成债权债务规模随汇率波动而大幅增减。同时, 各成员对联盟外部贸易实行了外汇配给等限制货币兑换的措施, 法德等国都是 1961 年才接受 IMF 第 8 条款的, 但是, 联盟内部贸易却实现了很高的自由化水平。1958 年欧洲支付联盟解体是由于各成员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已经变得可行。欧洲支付联盟的经验也为欧洲后续货币合作打下了基础, 包括 1979 年的欧洲货币体系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1992 年的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以及 1999 年的欧元区 (Eurozone)。

具体来看, 在每月末, 成员国将与其他成员国的净头寸报告给世界清算银行 (BIS), 后者承担了联盟结算代理人的角色, 但并不承担债权债务责任, 欧洲支付联盟自身有资本金, 美国马歇尔计划为其拨款 3.5 亿美元。BIS 采取中央对手方结算模式, 对各成员国净头寸进行轧差, 将各成员国之间的剩余头寸转换成各成员国对欧洲支付联盟的债权或债务。欧洲支付联盟设计了顺差国为逆差国融资方案, 每个成员国以 1949 年联盟内贸易额的 15% 作为限额, 当成员国逆差没有达到限额的 20% 时不用结算, 逆差超过限额的 20% 时需要用黄金结算逆差的 20%, 逆差超过限额的 40%、60%、80% 时需要用黄金和美元结算逆差的 40%、60%、80%, 当逆差国用尽其配额时, 欧洲支付联盟会强制要求该国采取经济调整政策。顺差国也有类似的结算要求, 只是临界百分比有所差异, 在达到该国限额之前, 仅有 40% 的顺差能够得到结算。

欧洲支付联盟各成员国的利益一致性虽然不及美联储和欧元区, 但也比较强。一战后各国错误政策导致二战爆发的经历增强了各成员国的合作意愿。正是由于具备一定程度的利益一致性, 欧洲支付联盟可以实施一系列弥补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措

施, 包括采用中央对手方结算方式消除各成员国信用风险, 一成员国对任何其他成员国的债权最终都会转化成对联盟的债权; 顺差国可以为逆差国进行融资; 以及逆差国作为回报, 愿意实行联盟内部贸易自由化。从结果看, 欧洲支付联盟对战后欧洲内部贸易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联盟存续期间, 成员国之间共有 460 亿美元的国际收支不平衡, 其中 200 亿美元以多边方式结算, 126 亿美元由于顺差国对逆差国的融资而被跨期弥补, 仅有 107 亿美元是用黄金和美元结算的, 占比 23.3%。

(四) 亚洲清算联盟

欧洲支付联盟的成功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激励。1974 年, 同样出于节省外汇储备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 印度、伊朗、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五国成立了亚洲清算联盟 (Asian Clearing Union, ACU), 目前的联盟成员还包括孟加拉国、缅甸、不丹、马尔代夫、白俄罗斯, 共 10 个国家。亚洲清算联盟作为一个区域性多边清算组织, 对经常项目进行净额清算。具体来看, 创设了 ACU 美元、ACU 欧元、ACU 日元 3 种“亚洲货币单位” (Asian Monetary Units), 各成员国商业银行互开代理行账户, 以 3 种“亚洲货币单位”进行跨境交易的计价和清算。成员国商业银行可以在他国为其代理行账户融资, 当无法从当地商业银行融资时, 可以请求本国中央银行代为向当地中央银行融资, 同时将这笔融资计入两国中央银行的头寸。每两个月, 各成员国中央银行分别用美元、欧元、日元对相应的 ACU 美元、ACU 欧元、ACU 日元净头寸进行一次结算, 伊朗中央银行充当联盟的结算代理。

总体来看, 亚洲清算联盟各成员国利益一致性较欧洲支付联盟更低, 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忍受度更差。与欧洲支付联盟通过设置限额实现顺差国为逆差国融资不同, 亚洲清算联盟仅能利用延期结算达到融资目的, 每两个月对各成员国未结算余额进行一次强制结算。亚洲清算联盟为了弥补顺差国为逆差国融资不足问题, 创造了货币互换安排。每个成员国都有权向其他成员国融资以弥补国际收支失衡, 最高额度为该成员国过去 3 年通过联盟机制向融资国付款的平均值, 同时, 不能超过该成员国净

赤字的一定比例，该比例为该成员国获得该融资国融资的最高额度与该成员国获得所有其他成员国融资的最高额度之和的比值。

（五）我国的双边本币互换

双边本币互换是各国中央银行间广泛使用的工具，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和欧央行都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签署了多种此类协议，主要目的是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2009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也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中央银行签署了一系列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截至2022年年末，有效协议29份，互换规模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与欧美国家双边本币互换主要关注流动性短缺不同，我国双边本币互换的关注重点是支持贸易领域的人民币结算，这使其成为顺差国为逆差国融资的一个渠道，与双边本币结算相结合后，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央银行间清算模式。

具体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与对方中央银行互开对方币种账户，当对方进口商从我国进口货物时，可以向对方商业银行贷款人民币，由对方商业银行向对方中央银行申请人民币货币互换融资贷款，对方中央银行审核通过后，从其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账户中将款项通过对方商业银行在我国的代理行支付给我国出口商。与前述四种模式相比，我国与签署双边本币互换的对方国家利益一致性更低，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忍受度更差。我国大部分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效期为3年，到期后需要续签，同时存在互换规模上限。我国双边本币互换融资贷款的发放要求比较严格，需要发放国中央银行逐笔审核，互换期限通常为3~6个月左右，与通常贸易融资期限相当。

（六）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1944年，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镇召开，创建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体系的核心是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和设立稳定基金，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承诺各成员国政府可按35美元兑1盎司的官价向美国政府兑换黄金，各成员国政府有义务共同维护

国际市场的黄金官价。设定各成员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若市场汇率超出法定汇率上下1%，各成员国政府有义务进行外汇干预，成员国法定汇率调整须得到IMF的批准。IMF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融资，其资金来源是各成员国缴纳的份额，其中25%以黄金或广泛接受的货币缴纳，其余部分可用成员国本国货币缴纳。总体来看，IMF各成员国利益一致性很低，IMF融资机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弥补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手段。

三、政策建议

从上文介绍的一些国际经验可以看出，通过中央银行间结算合作可以实现对美元结算的部分替代。但同时也要看到，美元占据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地位已长达80年，对美元结算的完全替代目前还很难实现，而且，发展中国家之间差异很大，协调各方利益非常困难。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双边本币结算等现有举措基础上，探索通过中央银行间结算合作来减轻美元结算依赖的可行方式。具体来看，首先根据现阶段国际环境和我国自身能力明确方案设计过程中的一些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可尽快付诸实施的方案和一个更为复杂的方案。

（一）我国需要坚持的原则

一是能够对现有美元等货币结算形成替代。这是我国开展国际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坚持市场化。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就脱离了以制度和合作为主的路径，转向以汇率自由浮动和跨境资金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这一形势已经持续了50多年，大量金融机构为此投入巨大精力，形成了巨大利益，在短期内改变将面临巨大阻力。三是包容性。新的中央银行间结算模式离不开政府推动，需要国际协调，要想减轻阻力，需要尽量减少强制性条款。四是有限责任。虽然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但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国际竞争力不足，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也还有限，与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的

美国差距非常大，没有能力像当年美国一样推动构建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二）我国双边本币互换的功能扩展

双边本币结算是减轻美元结算依赖的最直接方式。我国参与的双边本币结算属于双边全额结算方式，虽然简便易行，但结算资金使用效率低。结算资金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宝贵的，从欧洲支付联盟和亚洲清算联盟的经验看，提升结算资金使用效率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跨境贸易发展。我国双边本币互换为双边本币结算提供了一个融资渠道，对我国双边本币互换进行功能扩展，可以形成一个多边净额清算网络，从而大幅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并相应地提升减轻美元结算依赖的能力。

具体来看，与我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两国，允许一国利用其对另一国的人民币债权来归还该国对我国的债务，这样该国就可以不需要结算资金而仅利用融资完成结算。我国双边本币互换是逐笔交易的，要实现上述过程，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我国双边本币互换采用的方式是，两次换汇操作汇率相同，发起方给付对手方利息，类似于以本币为质押获得对方货币的贷款。需要的调整包括：允许发起方提前还款，利息按实际发生天数给付；允许拆分一笔互换，提前归还部分债务；在存在多笔互换时，从最先发生的一笔开始归还。

总体来看，这是我国介入程度较低的一种方式，执行难度也不大。我国双边本币互换是以对手方国家信用作担保，只要保证双方设置的互换规模上限不被突破，债务方由一国转移至另一国，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可控，我国债权安全是有保障的。双边本币互换的功能扩展，并不涉及多边协商，也不需要我国现有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签署国都参与，仅需要双边沟通，部分国家先参与并逐步推进，国际协调难度不大，现实操作上具有可行性。扩展我国双边本币互换模式建立起来的人民币多边净额清算网络，可以带动人民币在第三国之间的跨境贸易中的使用，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更大幅度减少各国对美元结算的依赖。同时，这种模式可以推广，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提供本币融资建立各自本币多边净额清算网络。

（三）深度介入方案的探讨

从本文第二部分的一些国际经验可以看出，中央银行间多边净额结算模式是摆脱美元结算依赖的有效途径。从制度设计角度看，中央银行间多边净额结算方案具有可行性，历史上的一些成功案例，以及目前仍在运行的案例，都可以作为新方案的借鉴和参考。具体到方案设计，要适应当前形势并充分反映我国诉求，因此，既不能照搬历史案例，也不能简单接受现有案例。设计一个新的中央银行间多边净额结算方案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详尽，本文主要对其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一是结算货币。由于新方案的目的是降低对美元等货币结算的依赖，因此不可能选择美元等现有国际主导货币。亚洲清算联盟的局限性之一就是仍然选择美元、欧元、日元作为结算货币，对摆脱美元等货币结算依赖的效果有限。新方案的一种选择是参与国的法定货币。为了公平起见，需要为各国货币提供平等准入条件，把最终选择权留给市场选择。可以预见，市场最终会集中到少数几种主权货币上来，还会持续出现优胜劣汰。汇率的确定是关键，为此，各参与国需要完善外汇市场建设，实现外汇直接交易，缩小买卖汇差，降低交易成本。新方案的另一种选择是创造一种超主权货币，但这方面国际协调难度比较大，同时，为了推广新的超主权货币，相关国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资源。

二是单一渠道与多渠道。欧洲支付联盟和亚洲清算联盟都要求成员国与联盟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只能通过联盟渠道结算，这是一种比较严格的强制性要求。如果允许多渠道结算，各参与国则会倾向于使用新方案获得融资来结算贸易逆差，而使用其他可以直接收到资金的渠道来结算贸易顺差，各国将面临博弈。但可以预见，各国是否选择新方案来结算，将最终取决于成本和效率。

三是全部结算与部分结算。要想实现多边净额结算，就不可能实时结算，需要为多边头寸轧差留出一个时间段，也就是结算周期，相当于顺差国向逆差国提供了融资。欧洲支付联盟结算周期为1个月，到期后各成员国余额中超出限额的部分需要结算。亚洲清算联盟结算周期为两个月，到期后各成

员国余额需要全部结算。采用部分结算方式，顺差国向逆差国融资规模将会非常大，在各成员利益一致性还不高的情况下，实现难度很大，相对保守的全部结算方式更适合目前情况。

四是融资方式。结算周期内顺差国向逆差国提供的融资，解决了多边净额结算问题。若想进一步提升结算资金利用效率，需要提供跨期融资。欧洲支付联盟采用的部分结算方式，本身就具有跨期融资功能。亚洲清算联盟专门创造了货币互换安排。还有一种方式是设立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稳定基金，为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融资。目前，发展中国家之间已经存在一些双边本币互换、多边本币互换、稳定基金的案例，例如，清迈倡议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现有合作机制可以作为未来合作的基础。

当然，要想让机制稳定运行，还需要对各参与国施加一些限制。这类限制种类很多，历史上的一些案例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经验，例如，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英国人提出的凯恩斯方案是一个多边净额结算方案，该方案对逆差和顺差过大的国家都设立了惩罚机制，同时要求各参与国对国际投机资本进行管制；又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求各参与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的逆差国需要接受经济调整计划；此外，本文第二部分介绍的欧洲支付联盟和亚洲清算联盟也都有各自的限制措施。

新方案除了上述制度设计外，更大的难度在于能否有效提升参与国之间的利益一致性，这既需要社会共识和政治支持，也需要相互监督的机制框架。从实际情况看，实现起来并不容易，这也是类似倡议很多但落地很少的原因。同时也要看到，新方案将促进参与国经济一体化，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敏感性很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想法，虽然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但仍遭到美国的明确反对。当前，“去美元化”是“去风险化”，并非与美脱钩，美国作为当今全球超级大国，没有国家愿意主动与美对抗。因此，我国对于参与创建中央银行间多边净额结算方案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要有充分认识，这是我国深度介入并相应承担更多责任和风险的一种

方式，需要综合考虑、谨慎行事。

参考文献：

- [1] 李永宁、郑润祥、黄明皓. 超主权货币、多元货币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核心利益 [J]. 国际金融研究, 2010 (7): 30-42
- [2] 苏治、王壮、吴优. 美元互换网络的发展历程及其有效性分析——基于 COVID-19 期间美元融资成本的视角 [J]. 亚太经济, 2023 (1): 41-50
- [3] 孙晓涛. 黄金国际结算的探讨与展望 [J]. 中国货币市场, 2023 (2): 78-82
- [4] 孙晓涛. 美元国际化的得失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 [J]. 清华金融评论, 2023 (12): 59-63
- [5] 王信、李俊. 欧元区央行间资金融通与国际收支失衡调整及危机应对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2 (3): 86-98+6-7
- [6] 王永利. 加快推进以我为主的全球清算体系建设 [J]. 国际金融, 2014 (9): 7-8
- [7] 夏广涛、李颖婷、胡汪音. 国际流动性安排的初心与实践 [J]. 中国外汇, 2022 (15): 15-18
- [8] 益言. 主要国际货币跨境清算结算体系研究 [J]. 中国货币市场, 2020 (1): 73-77
- [9] 张明. 全球货币互换: 现状、功能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潜在方向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2 (6): 65-88+5
- [10]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献综述 [J]. 金融发展评论, 2010 (3): 143-158
- [11] Eichengreen, B., Macedo, J.B., The European Payments Un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M]//Lamfalussy, A., Snoy, B. and Wilson, J., Frag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 How Can We Prevent New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Brussels: P.I.E Peter Lang, 2001:25-42
- [12] Rhee, C., Lea, S. Regional Settlement Infrastructure and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Case of Asia and the Renminbi[R].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2014(457)

(责任编辑:冯天真)